

抗战时期诞生在西北在区的地学刊物

——简析1939年在陕南城固复刊的《地理教学》

徐象平

本文论述了《地理教学》创刊和复刊的时代背景和演变过程,重点分析了《地理教学》复刊本(第五六期)刊载的中心内容及主要特色。指出复刊在陕南城固的《地理教学》,对我国西北地区在地理研究和文化教育方面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地理教学》于1937年1月创刊,是由原北平师范大学(今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发起创办的。当时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已践踏东北,又步步进逼华北,京津地区岌岌可危。在这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地理教学》的创刊,无疑给备受战乱摧残而一时沉闷的中国学术界和教育界带来了新鲜活力,也给忧患深重的广大民众带来了精神鼓舞和召唤的力量。特别是对激发人们的爱国意识和抗日信念起到了积极作用,因而创刊不到半年,连续出版4期均迅速售罄,在社会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七·七事变”爆发后,京津地区相继沦陷,北平师大也成为日军驻地,大量的图书资料、教学设备和实验仪器均遭破坏,广大师生流离失所,纷纷迁往内地,《地理教学》被迫停刊。

北平师大迁至西安后,与其他高校合并组成西安临时大学,不久因时局窘迫,又迁至陕南城固,更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今西北大学)。黄国璋教授担任地理系系主任。

陕南城固地处秦岭南麓,周围崇山峻岭,峰峦叠嶂,加之交通闭塞,战火无法波及,因而环境安定,秩序井然。随着教学、科研活动的相继入轨,《地理教学》复刊的条件也日趋成熟。于是,在1939年7月复刊面世,实现了全系师生和广大爱国读者的共同心愿。

回顾《地理教学》从创办到复刊的艰辛历程,黄国璋教授在《复刊词》中作了一番具体的陈述:“自(民国)二十六年元月起,出版《地理教学》月刊……出版虽仅四期,为时不过半载,订阅竟达七百余户,同人不敢自信内容丰富,但社会对于此种刊物需要之迫切,於斯可见。用是感责任之重大,思尽最大之努力,以期不负社会之期望。不幸‘七·七事变’发生,被迫停刊,每念及之,辄为扼腕,此后学校迁西安,继迁汉中,路途流转,屡欲复刊,终因环境关系,未克如愿。现学校驻新城已经周年,百事粗定,用始复刊,殊觉愧对读者,且目前纸张缺乏,手民难得,印刷装订,均无法令人满意,诸希原谅,并赐指教。”《地理教学》的复刊,对推动陕西乃至西北地区的地理研究和文化教育起到了重要作用。

复刊的《地理教学》带着鲜明的进步色彩,这从一些主要载文中就能得到证实。如黄国璋教授的《为什么地理是革命建国教育的中心科目》、《从地理方面检讨中欧政局的演变》、湛亚达教授的《对日抗战与中国地理》、金瑞莘先生翻译的《地中海问题》等文都是如此。现将其归纳起来,大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理学与爱国问题。在强邻入境、版图破碎的抗日战争时期,如何使人们对我国的地理状况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以激发其爱国信念,积极主动地投身到维护国土完整、救亡图存的抗日斗争中去,这在当时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鉴此,黄国璋教授撰写了《为什么地理是革命建国教育的中心科目》一文。他首先把地理教育与爱国问题联系起来,阐明了掌握地理学知识是建立和形成爱国观的重要前提,他说作为一个“良好公民的基本条件,既是爱国家爱民族,但是,想引起他敬爱国家民族的观念,首先要使他们知道自己国家的可爱,要达到这个目的,实施和加强地理教育,是一种最有效的方法。地理学能使学生了解本国自然环境的优越性,尤其是天然富源的丰厚,及其开发启用的可能性。明瞭这些优越性,自能启发国人的自尊自强心,以增加其爱国心理。”然后,他从人们的传统观念出发,分析了家乡观念的根源及其诸种表现,同时采取循循善诱、因势利导的方式,将家与国的含义巧妙地联系起来启发人们,并针对当时存在于部分人头脑中的国家观念淡漠,抗战态度消极的错误思想也给予了中肯的批评。他说:“东北四省丢了,内地的居民,不感觉是怎么的重要,甚而交通闭塞区域的老百姓根本就不知道这回事”。只所以产生这种错误的观念是“因为他对于整个国家不认识,不知道他是可敬可爱”的缘故。这里就非常现实的存在着一个全面普及地理教育,大力发展地理科学的问题。

因为要使每一位社会公民树立起爱国观念,必须先引导他们认为国家的状况如同自己的家乡一样,“要达到这个目的,实施和加强地理教育,是一种最有效的方法。”这就是说只有具备一定的地理学知识,才能了解和熟悉中国的地理状况,进而萌发和形成爱国的观念,并积极自觉地投身到维护国土完整和救亡图存的抗日斗争中去。反之亦然,这就是很简单的道理,但在当时国民文化素质和教育程度相对低下的战争时期,要让人们普遍接受却并非易事,就是说仅靠枯燥单一的八股式说教根本不行,还必须从我国实情出发,作出具体明确的阐释。于是作者依次从我国地理位置、面积、地形、气候、土壤、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等诸方面具体论述了我国自然环境的优越和物产资源的富饶。整篇文章激情饱满,文字张扬,集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使人易于接受,更能得到启发,正如作者在最后的小结中说道:“我们知道,我国位置的优良,幅员的广阔,各种地形的应有尽有,各种气候的应有尽有,各种衣料食料的应有尽有,如此种种,都在表现着我大中华之可爱可敬,表现着不容任何人来侵占我们的尺疆寸土,担任地理教育的人,如果能从这些地方去使学生彻底了解本国的环境和在世界上所处的地位,自然能增加青年对于本国的认识,因而启发其爱国心,养成其国家民族观念。”由此看来,地理科学的作用及其重要性在爱国问题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2. 地理学与抗日问题。在对日抗战问题上,我国占据着天时、地利、人和,这是取得战争胜利的基本保证。其中的地利,即地理优势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如何使我国的地理条件

转化成地理优势,在抗日战争中得到发挥。谌至达教授的《对日抗战与中国地理》一文对此作了详细的阐述。他首先分析了中日两国在地理上的差异性、违反性以及日本人对中国地理知识的贫乏和缺陷,盲目发动这场侵略战争的结果,必将以失败而告终。他说,海岛与大陆的违异是造成中日地理上的差异及一切矛盾性与违反性的根本因素。而日本侵略者不顾这种地理上的违反性,忘却了自身的先天不足和贫瘠性与中国空间人力的伟大性,不懂得征服中国不可能的道理。孤注一掷地发动这场侵略战争,其结局必然是灭亡。随后他列举了波斯远征希腊、亚历山大东征、拿破仑远征莫斯科、汉尼堡出征意大利以及欧战时威廉二世进攻英法等均难逃覆灭命运为典型事例,有力地说明“今日日寇的侵华,不过同类的历史重演一次罢了。”因为中国“这广大的空间,正是中国最后胜利的武器,可是日本人自始即忽略了这点,没有考虑到中国地域广大的因素和中国地理上的统一性,以致铸成今日的大错,这也许是日本人高估了自己的力量,以致把中国这特殊因素忽视了吧。”随后,他对中国地理上的“特殊因素”,即地域的广阔性和人口的众多性作了深入分析,并具体从我国华北、长江中下游、山西、四川、秦岭、西北等地形地势方面,详细论述了山地、高原、平原、盆地以及海岸地区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地位及其重要作用。最后他指出:“中国在地理上有着各种不同的地形(这决不是日本所能比得上的),这是中国文明永续不断的原因,也正是这次抗日战争最大的地理保障,中国有着许多地理单位,这单位决不孤独存在,而是与人体的四肢五官一样,有一贯联系的关系,不能任人随便割裂分离的。”总之,这是一篇很有价值的军事地理论文,它对了解我国地理上的“特殊因素”,充分发挥地理优势,把握战机,夺取胜利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同时,还说明“地势的险要固然要紧,而民众的结合,尤其十分重要,我们应把这两种国防力量配合起来,团结起来,才能争取最后胜利。”云云。

3· 地理学与国际问题。掌握一定的地理知识,不仅能对我国的基本国情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同时还能扩大视野,培养国民具有世界眼光,以便能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明辨是非曲直,养成正确地看待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另外通过了解和比较各国因地理背景的差异而导致对外政策的起伏变化,也可进一步认清资本主义列强和法西斯主义扩张霸权的企图。这对正确判断和分析我国政局变化的态势不无参考意义。鉴于此,黄国璋教授撰写了《从地理方面检讨中欧政局的演变》、金瑞莘先生编译了《地中海问题》等文均属这方面的上乘之作。前文主要从中欧各国所处的地形、地貌、资源、人口、民族、交通、城市、工业、商业以及各类矿藏能源的分布状况入手,探讨了它们地理背景上的差异,并指出这些差异是制约和影响其对德国法西斯政权采取不同对策的重要因素,也是导致欧洲政局发生一系列嬗变的重要原因之一。后文则从地中海的地理背景,政治环境出发,分别剖析了英、意、法三国为争夺地中海霸权而进行的一系列明争暗斗,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文化等领域,深刻地揭露了西方资本主义列强贪婪、残酷的真实面目和不择手段、甚至牺牲小国利益来达到控制海上霸权的罪恶目的。可以看出,两篇文章都能以地理背景立论,目的在于强调地理科学是了解国际局势变化的重要学科,只有掌握丰富的地理知识和世界知识,才能谙熟各国的地理状况及其优劣差异,也才能在这个“有强权而无公理,尔争我夺,国际关系极其复杂的时代”里明 国际变化的趋向和我国在世界上所处的地位,并迅速地作出反应和对策,以便沉着稳妥地应付复杂的国际事变云云。而所有这一切的实施,均须“有赖地理教育的推行与改进。”

除政治进步性外,追求学术上的求实性也是《地理教学》的一大特色。从有关这方面的载文来看,其学术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较前都有普遍的提高,并在很大程度上纠正了过去那种教条化、公式化的僵化研究模式,而注重学术研究与社会现实和客观实际相结合,力求使研究成果在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社会活动中发挥巨大效力。如卢惠如、黄绍鸣合写的《南郑商业地理之研究》一文就主要从南郑的地理条件入手,对其水陆交通、商业贸易的途径及种类、各种农作物、经济作物及其工商业的分布地区等进行客观分析,并对南郑的工商业演变过程、盛衰特点以及发展前景也作了深入的探讨,为该地区进一步开发建设提供了很多重要科学依据。还如郑象铎先生的《汉中盆地的自然与人生》一文,也是先从自然环境入手,对汉中盆地的成因、地形、土壤、灌溉、交通、气候、粮食作物及各种经济作物、土地利用以及各种资源状况等进行了详细的论述。指出汉中盆地一方面为全国的精华区域,如优越的自然环境、适宜的气候、发达的农业经济和悠久的土地开发和灌溉历史,但另一方面也存在着很多不足和弊端,如位置偏僻、交通闭塞等原因,封建保守的观念还很浓厚,教育未能普及,人们的生产条件和生活状况还非常落后等。因此,今后在注意开发水陆交通、增辟耕地,发展农林及其他多种经营的同时,还需要着力普及教育事业,提高人们的思想素质和文化素质,为进一步发展社会生产力,改变当地贫困面貌创造条件。可以看出,上述文章都能结合当地自然条件和物质生产状况,深入浅出地分析各种资源状况、劳动力素质以及发展过程中的利弊特点和不足环节,为当地在今后开发建设上指出了一些科学途径和有效方法。在治学上,上述文章都注意纠正过去那种“闭门造车”式的研究方法,而是走出书斋,通过大量的野外考察和广泛的社会调查,促使其研究成果在指导物质生产社会应用方面发挥较大的作用。

除此之外,殷祖英先生的《城固县气候志初稿》和刘慎鄂、薛贻源合写的《中国西北之植物地理》等文也都是严谨求实、学术价值较高的科研论文。前文主要根据两种气象记录和作者实际考察的结果撰写而成。加之文中图表齐全、数据准确、思路清晰,对当地的农业生产、工商贸易、水陆交通等具有重要参考意义。后文则是作者在长期的野外考察和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完成的。通过对植物分类比较的潜心研究,作者提出了植物分区的标准。即植物“受自然环境之限制,其分布并不与政治区域同。例如皖南植物之种类分布等情形,与江浙相类,而皖北则植物之概况,系与华北无异,故植物之分区,必须以自然区域为划分之标准始可。”作者提出的这一分区原则是依据植物的特性、种类以及生长的自然属性和分布规律来划分的,依此原则,作者将我国植物分布划分为八区,每一大区下又分为若干亚区,如西北区分为近西北(察绥)、远西北(新、青)、内西北(陕、甘)等亚区,每一亚区下再分为三级区域进行详细论述。可以看出,作者的这一植物划分体系在很大程度上纠正了过去多以人为因素,即以省级行政区为单位的划分准则,初步解决了长期以来植物分区研究中易为人们忽略的一个薄弱环节。

最后,在地理教学方面有郁士元教授的《地理测绘与地理教学》、姜玉鼎先生的《地理教学经验谈》等文。两文虽篇幅都不长,但也有很多方法上的改进和可取之处。如《地理教学经验谈》一文所云:“地理学的研究,较前既有长足进步,所以地理教学,当然也要随之改进。方今地理教学所采用的方法,可说是和往昔迥然不同。往昔的教法,是干枯的,是笼统的。把一

些‘山川名字’、‘物产种类’依着教本,按条逐目,诵读一遍,而不加解释,就算了事,今日的教学,是要摆脱账簿式的记载,而探讨地理事项的因果,开发地人的相互关系。”随后,作者列举了一些具体事例来说明这个问题。”譬如:蒙古居民,何以摆脱不了游牧生活?沿海居民何以多从事渔业?南洋经商的华侨,何以多出自闽粤?东北垦荒的农夫,何以多来自冀鲁?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推敲各地生活方法之所以不同的原因,无不与自然环境发生相当的关系。这种自然环境和人类生活的关系,均须一一确切说明,使学生透彻的了解,获得极深刻的印象。”由此可见,两篇有关地理教学的文章,其可贵之处就在于对传统的地理教学方法实行大胆的改进与创新,是以便学生“获得极深刻的印象”为目的

纵观《地理教学》全刊载文,不难看出,抗战爱国,维护国土完整和民族统一是该刊鲜明的主题,也是全刊的主脉。在这个主导思想下,理论研究与生产实际紧密结合,力求使地理学在开发当地富源,改善人们生活、提高民众文化素质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可以说追求政治上的进步性和学术上的求实性是《地理教学》的主要宗旨。

《地理教学》复刊后,为广大爱国读者和社会各界所注目,它激发了人们认识祖国、热爱祖国的情,呼唤民众积极投身到救亡图存的抗日斗争中去。所有有这些,都扩大了它在当时社会上的积极影响,也提高了在学术界和教育界的地位。但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当时处于战乱年代,政治局势动荡不定,办刊条件难以保证,加之人力、物力和经费等诸多困难,使《地理教学》复刊不久再度陷入停顿,成为我国西北地区学术研究上的一大憾事。

尽管当时《地理教学》在西北地区就发行了仅此一期(确切地说应是五、六期合刊)。但其意义是深远的,它不仅弥为珍贵,真实地反映了抗战时期西北地区在地理学的教学、研究方面的人才实力和学术水平,更重要的是它以推动陕西,乃至西北地区在地学领域里的研究、教育以及文化知识的普及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振兴作用。

(责任编辑 何燕民)

